

先秦“礼乐教化”演变与人文精神觉醒

□ 刘冠君

“礼乐教化”是中国古代政治、文化、教育制度的基本理念，体现于传统文化的各主要部分。“礼乐教化”萌芽于上古时期的原始宗教文化，至西周初期发展成熟。春秋战国时期，儒家站在新的起点上发展了“礼乐教化”，实现了其本质意蕴的升华。先秦“礼乐教化”的演变，在深层意义上映照出人文精神的觉醒与发展，奠定了传统人文精神的主基调，对此后数千年的中国文化产生了巨大影响。

先秦“礼乐教化”的演变。礼乐的起源可以通过古文献对“先王之乐”的记载来考察。如《周易·豫·象》云：“先王以作乐崇德，殷荐之上帝，以配祖考”；又如《淮南子·诠言训》云：“舜弹五弦之琴，而歌《南风》之诗，以治天下”。这些记载混杂传说与历史，也掺杂了后人的推断与理想，尽管不能完全被当作“信史”，但上古时期有着长久延续的礼乐文化，已成为普遍共识。上古时期，作为艺术的“乐”与作为宗教仪式的“礼”一体不分，主要表现为“舞”，用于“事神”。

到了夏商时期，早期奴隶制社会确立，社会政治规范意识逐渐觉醒，乐舞中的“礼节”等地位上升，“礼”“乐”初步分化。这一时期，“夏人尚鬼”“殷人尊神”，礼乐的主要功能依然是宗教祭祀，还没有自觉用礼乐来施行政治、道德、审美等方面的教育。

到了西周，“周人尊礼尚施”。从殷商“尊神”到西周“尊礼”，标志着礼乐文化的历史性演变。以往“礼”“乐”不分的状态彻底改变，“礼”作为行为规范的意识觉醒，宗教意义淡化，取代“乐”成为礼乐文化的代表。不仅如此，“礼”还与道德观念发生了密切联系，《诗经·大雅·民劳》云：“敬慎威仪，以近有德”。

除了“礼”的观念变化，西周礼乐文化最重要的发展是周公“制礼作乐”，使礼乐上升为国家治理手段和政治文化制度，充分表现出礼乐人文化、政治化、伦理化的发展趋向。周公“制礼作乐”，即周公领导的政治制度和文化体系建构。通过对殷商以宗教为中心的礼仪进行

规范化、体系化，使之与血缘宗法等级制结合，形成一整套政治化、伦理化的礼乐制度。这套制度由差序化的礼节、礼器及乐舞歌诗等构成，通过朝觐、盟会、军旅、祭祀、丧葬、宾客、学校、婚配等具体礼仪，把国家事务、社会生活等规范以“礼”的形式表现，用“礼”治理国家。

至西周末年，周王室衰微，诸侯纷争，私有经济发展，原有的血缘宗法等级制度和统治体制动摇，礼乐制度也在政治、经济的剧烈变革中不断受到冲击。春秋时期成为礼乐文化从最盛走向衰落的时代。到了春秋战国之际，“礼坏乐崩”趋于激化，诸子百家纷纷对此提出自己的思考，如道家、墨家、法家主

张废礼，儒家则试图“复礼”，为“礼乐教化”赋予君子人格塑造与化成天下的理想追求。

西周“礼乐教化”的人文文化表征。周灭殷商后，充分重视夏、商灭亡的历史教训，《尚书·周书·召诰》记载周公言：“我不可不监于有夏，亦不可不监于有殷”。有新儒学代表人物认为，周人对商周鼎革的冷静认知反映了统治阶层的精神自觉，周人以“敬德”等观念来指导自身行为，对自身行为负责，这是中国人文精神最早的出现。人文精神的自觉，本质上是人的道德理性精神的自觉。在此推动下，周人把对宗教天命观念的理性化认知与政治生活、道德规范紧密结合，并通过体系性、规范化的礼仪表现出来，使“礼乐教化”走向人文化。

在社会层面，礼乐的宗教功能弱化，政治、道德功能凸显。鉴于夏、商兴亡，周人对天命产生怀疑。在周人看来，决定天命转移、王朝兴衰的关键是“德”，必须“以德配天”。同时，“敬德”与天命的联系是民意，天命显现于“民情”，“民情”成为天命的依据。只要“敬德”就能保天命，而不必求助于宗教祭祀。于是，礼乐从“敬神事”转向“重人事”，宗教礼仪地位下降，人伦礼仪发达起来。周人对宗教的虔诚逐渐转向自身行为，落实到具体礼仪。通过以“礼”治国来践行“敬德”“保民”等政治文化思想。

在个体层面，有意识地通过“礼乐教化”对融道德与情感为一体的人格修养产生作用。“礼乐教化”的目的是从人的自主性出发，自觉强调人伦教化功能。据《周礼》记载，西周把“礼乐教化”作为治国之策，由专门职官负责实施。西周设乡学和国学，乡学主要是社会性的礼乐教化，国学主要培养贵族子弟的礼乐修养。国学分为小学和大学，小学教育以“六艺”为主，大学教育以“乐德”“乐语”“乐舞”为主，小学和大学都注重通过“道艺”来培养“德行”。在此，“礼教”“乐教”“诗教”初步分化，礼乐教化的情感教育特征被触及，成为孔子“兴于诗、立于礼、成于乐”人格修养的先声。

先秦儒家“礼乐教化”及其人文精神内涵。先秦儒家继承发展了西周以来的“礼乐教化”，提出乐教与人格修养、“乐”与政治伦理关系、礼乐与人性的关系等理论问题，并进行了深入阐发。《礼记·乐记》系统总结了这些思想，标志着儒家“礼乐教化”在理论上达到成熟。尽管孔、孟、荀等儒家代表人物的礼乐教化观念不尽相同，但其中的人文精神内涵却一脉相承。随着西汉“罢黜百家”，儒家思想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思想，儒家“礼乐教化”所承载的人文精神，对中华民族的性格养成和精神建构产生了深远影响。

第一，“礼乐教化”的核心在于向内寻求、主动而为的人格修养。孔子以“仁”释“礼”，为礼乐确立了“仁”的价值依据。“仁”可以理解为源于血缘关系的人性道德情感。“礼”因为获得了“仁”这个心理本源，从外在的强制规范变为人的自觉情感要求。于是，人行为规范的根源便可向自身寻求，即“为仁由己”。孟子发展了这一点，把“仁”“义”“礼”“智”都推源到人性，行仁守礼完全根源于人性自觉要求，因而人格修养首先是主动地“存其心，养其性”，教育的主要作用表现在使人“反求诸己”。荀子虽然在人性论上有别于孔、孟，但他仍强调自觉的人格修养，高扬进取有为的积极精神，重视通过社会性礼乐教化“化性而起伪”。

第二，“礼乐教化”立足于人，表现出“化成天下”的责任意识和价值取向。孔子从人的内在道德理性出发为“礼”确立依据。孟子把孔子以“仁”为核心的道德情感从血缘亲情推及人与生俱来的“良知”“良能”，“仁”就有了先验普遍性，成为人行为价值的源泉。由此，人的道德主体的内在在世界可以直接向外扩展于客观世界，天下国家成为道德实践的对象。每个人努力为他人作出奉献，就能在族群乃至世界的无限延续中证得永恒。孔子要求“修己以安百姓”，孟子提出“自任以天下之重”，不仅强调个人对他人、对群体的责任意识，也凸显出以小我成就大我、以国家和民族利益为上的价值取向。

第三，“礼乐教化”旨归于“中和”，代表着天人合一的境界追求。《礼记·中庸》云：“喜怒哀乐之未发，谓之中；发而皆中节，谓之和。中也者，天下之大本也；和也者，天下之达道也。致中和，天地位焉，万物育焉。”这揭示了“中和”的主要内涵。“中和”的基本意义是含蓄而适当，地位是天下之“大本”与“达道”，即天地万物的普遍规律。“致中和”的最终目的是天地各归本位，从而万物生长发育。“中和”追求体现在人格理想上，是孔子推为至德的“中庸”。“中庸”的内涵偏向于“中”，“中和”是“中”的精神在应事接物上的运用和呈现。实现“中和”的途径就是“礼乐教化”。同时，礼乐具有沟通天地人的作用，所谓“乐者，天地之和也；礼者，天地之序也”。通过“礼”“乐”共同发生作用的“中和”之制，才能修身养性实现“君子中庸”，进而以君子人格修养为基石，实现齐家治国，天下和谐有序，达成天人合一的理想境界。



江苏东临黄海，境内河川交错，水网密布，孕育了无数都邑名城、文人先贤，积淀了丰富多彩的地域文化。其中江南太湖流域的吴文化，源自长江下游的史前文化，夏商时期由宁镇地区向太湖流域扩展，成型于春秋时期定都姑苏的吴国，经千年演变和丰富，成为江南文化的核心之一，呈现出鲜明的“水文化”特质。

上善若水，水善利万物而不争。作为著名的“江南水乡”，吴地多水，先民们引水成田、以水开道、化水为景，呈现出“水港小桥多，人家尽枕河”的水乡图景。江南土地肥沃、物产丰饶，素有“鱼米之乡”的美称，南宋之时就有“苏湖熟，天下足”的谚语，“苏湖”即如今太湖流域苏州、湖州一带，苏湖地区粮食丰收，则天下富足。此外，丰富的水产鱼类、苏南“水八仙”等水生作物，以及由水而生、随水而来的盐业、酱业、酒业，进一步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江南饮食文化。江南城内河港交错，水道纵横，古语有“南船北马”一说，水运是江南城镇极为重要的交通方式，依靠长江水系和南北贯通的京杭大运河，人们“开门见河、出门摇橹”，水道河网日渐成为交通要道。《越绝书》中曾有记载：吴越人“以船为车，以楫为马，往若飘风”，可见，舟船桨橹早早成为吴地人民生活出行的工具，不仅如此，从舟船发展到航运，从交通运输到军事防御，再到水利防患，发达的水运拓宽了人们的活动空间，也开阔了江南人民的文化视野。江南风景秀丽、底蕴深厚，“日出江花红胜火，春来江水绿如蓝”是自然的绚丽风光，“人人尽说江南好，游人只合江南老”是旅人的诗意情怀，“青砖黛瓦”“小桥流水”“古典园林”是水乡的文化气息，城镇、村舍依水而建、因水而兴，形成了以水文化为元素的自然和人文景观，赋予了江南水乡丰富的文化内涵。“一方水土产一方物，一方水土养一方人”。沿江滨湖的地理环境、源远流长的历史底蕴也塑造了江南人民独特的人文特质，培育了尚德和谐、崇尚尚雅、开放包容、务实进取的水文化精神，传承了中华文明延续千年的水文化基因。

“海纳百川，有容乃大”是江南之水的开放包容。这种包容性离不开吴地人民虚怀若谷的胸襟与素养，也源于吴文化本身所具备的兼容并蓄的特质。吴地多水的环境，既方便了古往今来吴地人的出行，也使它们具有少封闭、善交流、广吸纳的性格。从先秦时期，泰伯、孙武、伍子胥等外来精英与子游、季札等吴地本土士人的互动，开启了此后数千年间中华文明在吴地交流、融汇、发展的精彩历程。江南文化受荆楚、中原等多种文化的影响，不断包容、丰富，独具特色。开放通达，善于包容吸纳的秉性决定了吴地人民在社会变革和发展的过程中，善于寻求机遇，灵活变通，如20世纪初第一轮民族工商业的崛起，改革开放之初发挥重要作用的“苏南模式”，还有21世纪以来的产业结构调整转型，吴地人民都带头领先，敢于创新突破，充分体现出“随物赋形，融汇百川”的水性特质。

“智者乐水，仁者乐山”是江南之水的智慧灵动。“食则稻鱼菱藕，居则枕河人家，行则舟桥两便，业则渔蚕至桑，习则书画文章”，从衣食住行到生产创作，皆以水为依托，水滋养着吴人的智慧才情，也孕育了丰富的江南精神文化奇迹。世有谓江南乃人才辈出之地，“吴乡信云美，山水饶秀丽”，名人之盛，得江山之助，而吴地崇文重教、学风兴盛也是重要缘由。明清时期，吴地曾涌现出大量文化世家，如苏州吴门画派、太仓娄东画派、常州学派、常州词派、常州画派、阳湖文派等文化派别；“一径抱幽山，居然城市间”的苏州古典园林，兼具城市之处所与山林之清幽；“生生燕语明如翥，听听莺歌溜的圆”的昆曲和百转春莺、一唱三

叹的评弹长盛不衰。数千年间，吴地繁华技艺迭代，手工技艺的精巧代代传承。苏绣、缂丝、宋锦、桃花坞木版年画、紫砂、惠山泥人、常州梳篦、金坛刻纸等非物质文化遗产，已经成为一张张独具风采的地方文化名片，向中国乃至世界展示吴文化的独特魅力。

“天下莫柔弱于水，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”是江南之水的务实进取品格。自“泰伯奔吴，功辟江南”起始，吴文化显示出积极入世、笃学尚行的特质，既高瞻远瞩，富有社会担当，又实事求是，尊重客观实际，呈现“实学”“实业”“为民”的特点。明朝时期，东林学派努力开创“开物成务”“躬行立教”的新伦理观，知行并重，求真务实，开启了“讲学不忘济世、研学与议政相结合”的风气。此外，19世纪中后期，在社会加速变迁和中西文化急剧融合的时期，吴地士子积极成为新思潮、新理念的接受者与传播者，其中代表人物薛福成积极投身洋务运动，在外交政策上有独到务实的见解，担任外交大使，实地考察各国经济发展，提出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、富民强国的建议，开创兴办实业之风气。这种实学实业、求真务实的社会风气，以及厚植其中的民生情怀，润物于无声，成为吴文化的精神宝藏，蕴含着推动经济文化发展的坚强力量。

历史是一面镜子，文化是一种力量。“春水碧于天，画船听雨眠”是江南吴文化赋予中华儿女“杏花烟雨江南”的家国情怀。在江南水乡之上，历代先民曾创造出丰富的文化成就，其独具特色的“水文化”特质，从地理学的概念延伸至社会和人文的内涵，诸多元素超越了既有传统，成为推动江南文化嬗变、社会前行的力量，为江南吴地乃至江苏的发展持续提供不竭动力。

□ 李立峰 王秋爽

国槐

□ 王孟查



行走在石家庄城区的老街道，随处可见国槐的身影。尤其在我居住的槐中路，以及槐北路、石纺路、工农路等，几乎整条街都是这种树。它们粗壮的身树挺直屹立，硕大的树冠，巨伞般笼罩大地，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。

国槐树形高大，枝叶茂密，木质坚硬，花香怡人，故常被用作绿化。与大多数树种不同，它的花期在盛夏，花蕊呈淡黄色，可煮食，也可作中药或染料，还是一种重要的蜜源；未开的槐花俗称“槐米”，也是种药材；种子俗称“槐连豆”，含淀粉，可供粮食；它的皮、叶、蕾、花及种子皆可入药；花及荚果，有清凉收敛、止血降压作用；叶和根皮，有清热解暑作用，可治疗疮毒；主干供建筑、制作家具使用，坚实耐久。可以说，国槐浑身都是宝。

在我国广大北方地区，槐树被视为“守土树”。许多村的村口、祖庙前或街心，都会种有一棵大槐

树。《说文解字》中曰：槐，木也，从木鬼声。民间流传“槐”隐含“人死入土，魂归祖庙”之意，所以人们通常会在家乡比较明显或重要的地方栽下它，以候望游子叶落归根。而“槐”与“怀”又为谐音，借此表示游子心怀故里，不论浪迹何方，都要永远记得家乡。山西洪洞的大槐树，更被一代又一代远离故乡的游子，视为永远的家与根！

儿时，我们村的正街心就有一棵双人才合抱的大槐树。树上挂着口铁钟，树下支着座石碾。春天里，当乱花渐欲迷人眼的时候，它却淡然不惊，枝头不见一丝绿意，融在一片灰色之中。大风从枝丫间疾速划过，留下一串呜呜的鸣响。然而，正当你以为它已沉睡不醒的时候，随着大地隆隆滚过的春雷，它一夜之间猛然醒来，树枝上开始冒出点点嫩芽。刚萌出的叶面上，有一点点白色，雾气蒙蒙，像小姑娘般欲说还羞。在晚春的艳阳照耀

下，它的叶一天一个样，展现出无比强大的生命力，很快就将树冠罩得密密实实，也投下一片浓浓的阴凉。

炎夏来临，烈日当头，知了声声。槐枝上露出细碎的槐米粒，一簇簇，黄中带绿，暗香袭人。这里成了老人、孩子避暑纳凉的最好地方。老太太们坐着蒲团做针线、聊天，孩子们围着大槐树和碾台尽情地玩耍，推车挑担的货郎赶到这也会驻下脚，时而有只猫蹿到碾盘上眯个盹、有条狗卧到碾盘下面吐着长长的舌头来凑热闹。不定哪天晚上，还会有说大鼓书的行走艺人到来。他们似乎来自很远的地方，带着简单的行囊，操着明显的外乡口音。在槐树下摆开阵式，一手持夹板、另一只手拿着鼓槌，敲敲打打就说唱起来：“三国纷纷民不安，东吴西蜀汉中原。曹操占了中原地，皇叔刘备驾坐西川。那东吴，一树繁花与村民从容厮守、温

柔以待。不知不觉间，就度过了炎夏，进入凉爽的秋天。槐花也变身

为槐连豆，一嘟噜一串挂满枝头。槐连豆的豆荚，外表晶莹剔透，有豆仁的地方鼓起一个个肉乎乎的小包，像一串串水头十足的翡翠。里面的汁液又苦又黏，包裹豆仁的膜，细腻柔软，白如脂玉，剥出来能吃。它在秋雨中静默，在秋风里嬗变，渐成一树金黄，一片片叶子无声落下。这时候，人们把槐连豆扒下来，用石碾轧掉外皮，将豆仁做成豉酱，“入鼎煮过熟，加餐愁欲无”。

年复一年，国槐绿了黄，黄了绿。一代又一代国人，守望着她，也守望着一方安宁祥和的日子……

